

人物素描

温铁军:在心忧三农20年后有更大关切 (上)



□倪小林

在现代中国,真正能够沉下心来关注农民问题的,并非始于温铁军。80多年前,从耶鲁大学毕业、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海归”晏阳初有一句掷地有声的话,“没有农民,谁能活在天地间!”这句话感动过很多后来者。温铁军就是其中之一。

算起来,温铁军应该是别名最多的人:温三农、用脚做学问的人、九亿农民的代言人……尽管他接纳各种批评,拒绝参与热点辩论,从来不上博客,却仍有媒体称他为“意见领袖之布谷鸟”、“最受网民欢迎的嘉宾”;最近还有媒体首次把他评为“最具行动能力的中国三农人物”。仔细掂量每一个称谓,足以感受温铁军在中国经济界的独特影响力。

心系农民要有勇气

人生总有一些不解之缘,曾经在吕梁山下插队的温铁军,1983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曾参与组建第一家民办商业媒体;接着在1985年发起并组织首批记者团驾摩托车沿黄河考察8省40多个市县的社会经

济发展状况,那是我国新闻界首次跨国际的大型调查。如今谈起那次历险,他淡淡一笑:那时候年轻,车没牌照,人没驾照,从来没碰过摩托车,就敢长河落日,大漠荒原纵横万里,那叫玩命!就在那年,他调入了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专门从事农村政策和调查研究工作。用他自己的话说,从那以后大约20年在搞农村研究,其中11年在做基层试验区调查研究。调查研究原本是我党一贯坚持的作风,可是进入信息社会人们获取信息渠道增多,下乡去搞调查变得稀罕了。温铁军不理睬潮流变化,依然故我地长期深入乡村,了解农民的生存状况。他1988年迄今获得的多项科研成果,绝大部分与农村和农民有关,2003年底他登上中央电视台十大年度经济人物颁奖台,还是因为他为农民代言。

全身心长期投入于中国农村研究是需要勇气的。他总结自己在农村的长期试验时说:社会科学采用试验方法才能真正成为科学,而试验其本身就是要求不断试错,不断证伪。任何理论家的观点,假说,都只能在实践中接受

检验,而且只能部分地得出相对真理。但这也是理论和实践真正相结合的难处。有时他明明知道自己的努力有可能付诸东流,为了解缓三农问题他不得不顾得失,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涉足了诸多农村政策问题调研,例如农村土地制度、乡镇企业股份合作制、小城镇建设、农业基本经营制度、农业产业化中的组织制度建设、农村税费改革、农村金融与农户信用、全球化与中国粮食趋势研究等等;靠着20年不懈的努力,他终于取得了在中国农村问题上的发言权。

一个不断试错,不断报忧的人时常会很尴尬地违反官场“潜规则”,这对于个人的在官本位体制中的晋升当然是不利的。但是,恰恰是这样的坚持,使他对于国家政策最终调整为“三农问题重中之重”做出了重大贡献。



本期人物话语

中国股市应顺其发展

格林斯潘(美联储前主席):中国股市的如虹涨势应该顺其自然,建议中国政府不要过多干预股市,应该放手让市场按其自身轨道发展。

中国改革、欠发达地区经济起飞的关键是资源资本化、农村高利贷问题、农民工作问题和新时期的劳资关系等,大都是当下社会最为关注的热点。

近几年,城市化改革带来很多尖锐的社会矛盾,温铁军多次质疑我国的医疗制度和教育制度产业化把农民排斥在外的现实。他认为:教育对农民来说是一种公共品,可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20世纪90年代,财政用于农村基础教育的投资大概只占1%至2%。农村基础教育要让农民拿钱,这是严重的不公平。医疗卫生有同样情况。农民根本没有得到起码的国民待遇。

他就像个喋喋不休的絮叨老人,走到哪里只要有会,必为农民和农村问题呼吁。他曾经自嘲:“我感觉是一只想站而始终没站起来的猴,曾经试着站起来过,发现看得更远了,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更丰富了。但却因此不敢再站着,因为众猴都趴着。有人说我低调,那是因为我必须趴着,并且不得不比猴群爬得更低,以掩盖我曾站起来的事实。”采访时向他追问这个说法,他补充道:不是猴群离不开我,是我离不开猴群。

立足国情看世界

墨西哥贫民窟,印度游击区,都留下了温铁军的身影。他不是记者却采用了新闻报道最基本的手法深入实地直接观察,当地的环境最害怕的地方,他也一定要去看看。不是好奇,而是要弄清实情;为什么发展中各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那么多农民会流离失所?为什么没有哪个发展中国家敢于像中国这样强调三农问题和新农村建设?为什么在资源环境最宽松的巴西,农场规模动辄就是数百上千公顷,农业经济学理论追求的规模效益实现了,但是农民照样贫困?而且这个人均土地资源大于中国几百倍的国家,竟然还长期解决不了饥饿?

考察了近40个国家和地区,他深知,墨西哥、印度、孟加拉等那些没有土地或被剥夺土地的农民的困境,是他们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所不得不承受的代价。而一国经济发展如果是以产生大量贫民窟、甚至引发暴力冲突为代价,在温铁军眼里就不算是成功的。他对于那些仅仅了解发达国家和个人别发展中国经验皮毛,就一味强调“拿来”的人公开了自己的观点:

“发展中的人口过亿的国家之中,只有中国是真正完成了土地革命的土地革命又是民主革命的核心内容,因此,唯独中国不存在发生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制度环境,可以通过新农村建设来改善农民处境。而其它国家出现农民起义的地方,至今暴力冲突仍然此起彼伏,我去考察过墨西哥的农民起义、印度的游击区,以及其他国家的农民对抗性冲突,根本原因是土地私有化。”

温铁军从比较研究中得出结论:今后无论谁谈私有化,就让他去那些国家的贫民窟看看也许就明白了。中国的农村如果也制造出一两亿无地农民,就要出大乱子。我们要尽可能不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制造贫民窟!

在评价自己的学术研究时,温铁军称他提出的基本假设其实是一个简单到尽人皆知的判断:中国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人口膨胀而资源短缺的农民国家追求工业化的发展问题。”

倘说这个判断尽人皆知,中国的三农问题怎么会在解决的进程如此艰难!不过,一句“尽人皆知”,还是表现出他的学者风范——谦和自省。

来自日内瓦

瑞士私人银行承担无限责任

□徐千惠

目前,私人银行在全球银行业中因发展较快而备受关注。今天,我们不妨透过了解瑞士的私人银行业发展情况,来跟各位读者聊聊私人银行的一些基本特征。

瑞士银行业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14世纪,日内瓦就已出现了今日的信贷业务。此后,瑞士银行业发展较快,并跃居欧洲首位。在20世纪,由于瑞士在政治上稳定、货币更具灵活的自由兑换性,以及瑞士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期间的中立国身份等因素,都促进了1950年后瑞士银行业的迅速扩张。

如今,瑞士尤其是日内瓦已成为欧洲最大的贸易金融中心。一提到资产管理(财富管理),人们自然会联想到瑞士。事实上,日内瓦私人银行管理的财富资产总额约占全球总数的30%至40%之巨。值得一提的是,日内瓦银行业成功地将其强大的传统优势与对财务隐私的尊重结合起来,而著名的瑞士银行保密法为其提供了坚实的后盾。当然,瑞士银行业也恪守银行界有关规章制度以及各种反洗钱的法规和法规,以及受瑞士监管局及其他国际组织制定的各项政策及准则的约束。

目前,瑞士私人银行主要有两家:Pictet & Cie 和 Lombard Odier Darier Hentsch Group。这两家私人银行名字均以家族名字命名的,且银行的所有权完全归家族所有。通常这些银行的历史非常久远。

与其他一些国际大银行如花旗集团不同,瑞士的传统私人银行主要特点在于其承担了无限责任。假如这些瑞士私人银行倒闭了,无法如数归还你的资金,你甚至可以都拿走这些私人银行拥有者的家族资产。相反,如果假定花旗集团倒闭了,其客户只能依据花旗银行的账面资产获得部分或全部赔偿。

当然,目前许多私人银行往往是非上市银行。私人银行的银行业务服务的人群范围还相当小,这也与公众银行有很大的区别。它们更倾向于保护客户的财务隐私性,并提供高效和优质的个性化服务。

正因为这样,瑞士私人银行在操作及运行理念上与其他国际综合性银行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这也是瑞士私人银行的特殊性及其操作特征。

如今,瑞士私人银行所具有的诸多自身优势及鲜明特征,还在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将其储蓄资产及资产管理业务交给这些私人银行管理。其实,全球范围内私人银行的银行业务发展速度非常快,其影响已渗透到了亚洲等地区。

多声道

2006年污染物排放不降反升

潘岳(环保总局副局长):中央在“十一五”规划中提出“每年节能4%,减排2%”,结果2006年主要污染物排放不降反升,平均每两天发生一起突发性环境事故,群众环境投诉增加了三成。经济如果出现环境问题,宏观调控可以解决;但环境出了问题,是多年都难以扭转的。当前我国的环境形势十分严峻,环境与经济的矛盾空前突出。环境资源问题已经对建设“和谐社会”构成了严重挑战,要改变现状,就得建立新制度。

我国企部分行业遭遇玻璃门

黄孟复(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当前民营经济发展存在的最主要问题就是部门落实“非公经济36条”的措施推进不平衡。在一些垄断部门和行业、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领域,民营经济的进入遇到大量的“玻璃门”现象,即看得见、进不去,一碰就碰壁。这些行业和领域主要包括邮政、通信、电力和金融等,多是以资本实力、技术水平和从业资历等各种理由抬高行业准入门槛,使得民营企业实际上进不去。(雨人摘编)

美洲观潮

外汇投资 测不可测 为不可为

□徐程

任何学问到了一定高度都要上升到哲学的地位,外汇操作也不例外。千万不要相信可以凭一两手高招可以久胜汇市。任何高招都有弊端,既能让你赚钱也能让你亏钱。这就是金融展上为什么那么多“大师”拼命想赚讲课费的原因所在。真的能在市场上赚大钱,何必那么费劲费力地来推广软件,招收学生呢?

那么什么是交易的哲学呢?笔者自认智慧不够,无法总结。在此不揣鄙陋抛砖引玉。要说的有两点,一是市场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测的,二是人的大脑不是天生用来做交易的,我们做交易是在做一件事。比如,前两天美国出的非农数据不好,美元先大跌,突

然又从Day low升到Day High。我那位天才交易家朋友大输特输。他一直以炒非农为业,而且几乎每次都有斩获。这次他输得没了脾气。其实这样的阵势多去了,只是他刚人行没碰到而已。

市场可测是相对的,不可测是绝对的。这就决定了遵守纪律及时止损往往是双刃剑。很多情况是砍单正好砍在脚脖子上,我亲眼看到一位大户砍完单15分钟后市场又回来了,一进一出损失五万美元。这位老兄的脸色真是惨败如纸。然而不止损也不行,可能让你从此不得翻身。那么有没有办法可以应付这种不可测的办法呢?有,做“突破”就是一个有效的方法。所谓突破就是Momentum交易法。当市场沉寂下来,并完成整固必然向上或向下突破。许多交易

家会在两个方向同时设伏,用stop enter获得成功。但事情还那么简单,很多情况会导致两面止损,即左右吃耳光的结果。本人研究的方法是利用技术分析一面设伏,在70%可能突破的方向设伏,效果甚佳。这就是本人说的第四种交易法。

人的大脑可能适合于各种智识活动,但不适合做交易这类活动,或者说人的大脑不是为做交易而设计的。也许做交易赚钱太轻松,上帝不允许人们用这样的方式谋生。有朋友算过一下,就是看日交易图,只要你单子进去出来都在左面波动的高点和低点,一个月你就可以成为百万富翁。(图的左面是历史,右面是未知的将来)

有时市场上下冲突,那些“天才”会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很多时候会得逞。我也打心底佩服一阵,但好景往往不长。他们有时会遇到左右都不逢源的情况。紧张焦虑不说,结果是怎么做都是错。这种交易法被有些大师称作Sucker交易法,即“吃奶的人的交易法”。(初出茅庐的人事实上你的脑子再快也快不过市场,市场有时就是专门修理那些紧追不舍的人的钱。倒是那些在一旁洞若观火,大智若愚的人避免了灭顶之灾。

哦哟,真是玄之又玄,各位可能会说我是在故弄玄虚。不做交易不是玄学。大致有些路经可致获胜的彼岸,毕竟还有5%的人长期盈利。本人有一种简单的操作法在两个月内从汇市赚了近百元。(可参看本人网页:www.eastforex.com的讨论区里的报

学术思潮寻踪

贫困陷阱理论的嬗变

□梁怡

经济学领域对“贫困陷阱”的研究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到18世纪的马尔萨斯人口陷阱理论。所谓“贫困陷阱”,是指处于贫困状态的个体、家庭、群体、区域等主体因贫困而不断再生出贫困,长期处于贫困的恶性循环中而无法自拔。马尔萨斯极为关注农业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后果。按照他的分析,在土地供给数量不变和人口增加的条件下,每个额外生产者耕作的土地数量不断减少,他们所能提供的额外产出会下降;这样虽然食物总产出会不断增加,但是新增农民的边际产量会下降,因而社会范围内人均产量会下降。这样人均增加比例会大于食物增加比例,如果人口增长得不到控制,饥荒将在所难免。这一分析暗含农业技术不变和人均占有耕地面积下降两点假设,因而其作为一个条件预测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中是有效的。但过去200多年的人类发展事实和社会经济状况却与其假设条件完全不同,农业科技不断取得革命性突破,先进农业技术和要素投入,极大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农业和食品增长显著超过人口增长。所以,历史证明马尔萨斯人口陷阱是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不适当运用。

关于贫困陷阱理论的第一次大讨论,发生于20世纪4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的发展经济学的第一个繁荣时期。代表人物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拉格纳·纳克斯和美国经济学家纳尔逊等。

纳克斯从国家层面着手探究贫困陷阱理论,他在《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一书中,根据对发展中国家长期贫困根源的考察,提出了“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长期存在的贫困,是由若干个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着的“恶性循环系列”造成的,其中,“贫困的恶性循环”居于支配地位;从资本的供给看,发展中国家存在“低收入——低储蓄率——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的恶性循环,而从需求上看,存在“低收入——投资引诱不足——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收入”的恶性循环;供给和需求这两个恶性循环之所以会形成,是由于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过低,人均收入过低是因为资本稀缺,而资本稀缺的根源又在于人均收入过低,低收入使一国贫穷,低收入和贫困无法创造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储蓄,而没有储蓄就没有投资和资本形成,从而又导致该国的低收入和持久贫穷。

纳尔逊在《不发达国家的一种低水平均衡陷阱》一文中,提出了与“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相类似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把贫困看作是一种自我维系的循环过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表现为人均收入处于维持生命或接近于维持生命的低水平均衡状态,只要人均收入低于人均收入的理论值,国民收入的增长就会被更快的人口增长所抵消,从而被逼迫回到维持生存的水平上,并且固定不变。在最低人均收入水平增长与人口增长率相齐的人均收入水平之间,存在一个“低水平均衡陷阱”。在这个陷阱中,任何超过最低水平的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都将被人口增长所抵消,这种均衡也是稳定的。要想冲出“低水平均衡陷阱”,发展中国家必须进行大规模的资本投资,使投资和产出的增长超过人口增长。

从纳克斯和纳尔逊的理论中可以看出,他们都把持续性贫困归咎于经济的欠发展,强调贫困的存在只因为资本投资的缺乏。这就过分强调了储蓄作用和资本积累的重要性,具有片面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新增长理论和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以及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关于贫困陷阱理论的研究步入了新阶段。

Kremer创建了一个“0—环”(0—Ring)生产函数,来探讨人力资本投资的互补性和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均衡结果的影响。Baaland等将市场结构内生化为一个基于“创造性破坏”的多部门增长模型中,探讨了创新溢出和不完全竞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的研究共同指出了政府部门对经济活动进行协调的必要性。为了促进经济发展,政府有必要通过各种措施来协调经济活动的开展。

Azariadis等将收入风险引入一个行为人的职业选择模型,建立了国家长期贫困根源的考察,提出了“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在一个标准的新古典交迭模型中引入信贷市场不完善变量,分析了金融市场全球化对世界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贫困的恶性循环”居于支配地位;从资本的供给看,发展中国家存在“低收入——低储蓄率——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的恶性循环,而从需求上看,存在“低收入——投资引诱不足——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收入”的恶性循环;供给和需求这两个恶性循环之所以会形成,是由于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过低,人均收入过低是因为资本稀缺,而资本稀缺的根源又在于人均收入过低,低收入使一国贫穷,低收入和贫困无法创造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储蓄,而没有储蓄就没有投资和资本形成,从而又导致该国的低收入和持久贫穷。

纳尔逊在《不发达国家的一种低水平均衡陷阱》一文中,提出了与“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相类似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

把贫困看作是一种自我维系的循环过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表现为人均收入处于维持生命或接近于维持生命的低水平均衡状态,只要人均收入低于人均收入的理论值,国民收入的增长就会被更快的人口增长所抵消,从而被逼迫回到维持生存的水平上,并且固定不变。在最低人均收入水平增长与人口增长率相齐的人均收入水平之间,存在一个“低水平均衡陷阱”。在这个陷阱中,任何超过最低水平的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都将被人口增长所抵消,这种均衡也是稳定的。要想冲出“低水平均衡陷阱”,发展中国家必须进行大规模的资本投资,使投资和产出的增长超过人口增长。

从纳克斯和纳尔逊的理论中可以看出,他们都把持续性贫困归咎于经济的欠发展,强调贫困的存在只因为资本投资的缺乏。这就过分强调了储蓄作用和资本积累的重要性,具有片面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新增长理论和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以及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关于贫困陷阱理论的研究步入了新阶段。

Kremer创建了一个“0—环”(0—Ring)生产函数,来探讨人力资本投资的互补性和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均衡结果的影响。Baaland等将市场结构内生化为一个基于“创造性破坏”的多部门增长模型中,探讨了创新溢出和不完全竞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的研究共同指出了政府部门对经济活动进行协调的必要性。为了促进经济发展,政府有必要通过各种措施来协调经济活动的开展。

Azariadis等将收入风险引入一个行为人的职业选择模型,建立了国家长期贫困根源的考察,提出了“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在一个标准的新古典交迭模型中引入信贷市场不完善变量,分析了金融市场全球化对世界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贫困的恶性循环”居于支配地位;从资本的供给看,发展中国家存在“低收入——低储蓄率——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的恶性循环,而从需求上看,存在“低收入——投资引诱不足——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收入”的恶性循环;供给和需求这两个恶性循环之所以会形成,是由于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过低,人均收入过低是因为资本稀缺,而资本稀缺的根源又在于人均收入过低,低收入使一国贫穷,低收入和贫困无法创造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储蓄,而没有储蓄就没有投资和资本形成,从而又导致该国的低收入和持久贫穷。

纳尔逊在《不发达国家的一种低水平均衡陷阱》一文中,提出了与“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相类似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把贫困看作是一种自我维系的循环过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表现为人均收入处于维持生命或接近于维持生命的低水平均衡状态,只要人均收入低于人均收入的理论值,国民收入的增长就会被更快的人口增长所抵消,从而被逼迫回到维持生存的水平上,并且固定不变。在最低人均收入水平增长与人口增长率相齐的人均收入水平之间,存在一个“低水平均衡陷阱”。在这个陷阱中,任何超过最低水平的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都将被人口增长所抵消,这种均衡也是稳定的。要想冲出“低水平均衡陷阱”,发展中国家必须进行大规模的资本投资,使投资和产出的增长超过人口增长。

从纳克斯和纳尔逊的理论中可以看出,他们都把持续性贫困归咎于经济的欠发展,强调贫困的存在只因为资本投资的缺乏。这就过分强调了储蓄作用和资本积累的重要性,具有片面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新增长理论和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以及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关于贫困陷阱理论的研究步入了新阶段。

Kremer创建了一个“0—环”(0—Ring)生产函数,来探讨人力资本投资的互补性和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均衡结果的影响。Baaland等将市场结构内生化为一个基于“创造性破坏”的多部门增长模型中,探讨了创新溢出和不完全竞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的研究共同指出了政府部门对经济活动进行协调的必要性。为了促进经济发展,政府有必要通过各种措施来协调经济活动的开展。

Azariadis等将收入风险引入一个行为人的职业选择模型,建立了国家长期贫困根源的考察,提出了“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在一个标准的新古典交迭模型中引入信贷市场不完善变量,分析了金融市场全球化对世界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贫困的恶性循环”居于支配地位;从资本的供给看,发展中国家存在“低收入——低储蓄率——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的恶性循环,而从需求上看,存在“低收入——投资引诱不足——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收入”的恶性循环;供给和需求这两个恶性循环之所以会形成,是由于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过低,人均收入过低是因为资本稀缺,而资本稀缺的根源又在于人均收入过低,低收入使一国贫穷,低收入和贫困无法创造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储蓄,而没有储蓄就没有投资和资本形成,从而又导致该国的低收入和持久贫穷。